CHINESE ZHUANG STUDIES LIBRARY
Series Editors:He Longqun & Li Fuqiang

中国壮学文库

主编◆何龙群 李富强

MEDICAL CULTURE AND TRADE IN MATERIA MEDICA IN THE GUANGXI ZHUANG REGION

广西壮族地区的医药文化及药材贸易

杜立平 著
Du Liping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MEDICAL CULTURE AND TRADE IN MATERIA MEDICA IN THE GUANGXI ZHUANG REGION

广西壮族地区的医药文化及药材贸易

Du Liping
杜立平 著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西壮族地区的医药文化及药材贸易/杜立平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5

（中国壮学文库/何龙群，李富强主编）

ISBN 978-7-105-09289-5

Ⅰ. 广… Ⅱ. 杜… Ⅲ. ①壮族—民族医学—文化—研究—广西②壮族—民族医学—药材—市场—研究—广西

Ⅳ. R291.8 F724.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585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304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22.00 元

ISBN 978-7-105-09289-5/R·274（汉 4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中国壮学文库》序

壮学是在传统壮族研究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新兴的概念，是一个新时代的学术话语。它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西壮学学会的成立，而逐步步入学界视野的。它的产生和成长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它的构建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一、壮学：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

壮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壮族人口16 178 811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105 226 114人（不含台湾省的少数民族人口）的15.38%。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最集中的地方，共有壮族15 600 854人，居住于广西各地，占广西少数民族人口的85.7%，占全国壮族人口的96.43%。其分布状况为桂西稠密，桂东、桂北稀疏。在广西，壮族人口占总人口90%以上的县，有靖西、天等、德保、大新、隆安、龙州、平果、忻城、那坡等县；壮族人口占总人口90%以下、80%以上的县市，有田东、田阳、邕宁、武鸣、东兰、上思、凭祥、扶绥、上林等；还有14个县市区的壮族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下60%以上。除广西外，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麻栗坡、马关等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云县，贵州省从江县，四川省宁南、木里、会东、会理等县，陕西省柞水县红岩寺兰家湾等地也有少量壮族分布。

壮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族源不仅可以上溯到有史时期的“西瓯”、“骆越”，而且可以追溯到岭南的史前人类。千百年来，壮族及其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或镌刻在祖国的锦绣河山，或以“西瓯”、“骆越”、“乌浒”、“俚”、“僚”、“俍”、“僮”等名义，甚或是以“蛮”的名义，记载在历代史籍当中，凭由人们对之考证和探究，为之感叹和自豪。

然而，对壮族及其先民进行研究的历史并不长。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壮族研究是在19世纪末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脚步而到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如同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产儿”(the child of colonialism)一样，壮族研究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沿印度洋和太平洋自西向东扩张，在瓦解了印度、瓜分了东南亚之后，把贪婪的目光盯向了中国大陆。为了巩固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统治，打通一条由东南亚直入中国腹地的通道，他们开始研究我国南方各省的历史、地理、民族、语言、习俗等问题，以作为军事侵略的先导。这些研究当中就包括了对壮族的研究。1885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柯奎翁(A. R. Colquhoun)著的《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ns)及伦敦大学拉古伯里(Tettien de La-couperie)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是目前所见的涉及壮族的最早论著。此后，法国人邦德里(Pierre Lefevre Pontalis)1897年在荷兰发表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invassion Thaie Indochine)、英国人戴维斯(H. R. Davis)1909年在英国剑桥出版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美国人杜德(W. Clefton Dodd)1923年在美国艾奥瓦出版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英国人吴迪(W. A. R. Wood)1926年在伦敦出版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都论及壮族的族源和分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继西方人研究壮族之后，泰国人也加入了此项工作。有“暹罗历史之父”之称的泰国共丕耶达玛銮拉查奴帕亲王在1925年出版的《暹罗古代史》中，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壮族。接着，泰国拍耶亚奴曼罗罗吞写了《泰掸族系考》一文，大量论述了广西等地壮族的情况。然而不论是西方人，还是泰国人，这时的壮族研究仅限于族源和分布，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单一，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上局限于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畴。由于研究者都是以东南亚泰族为参照系，当他们发现壮泰民族有密切关系后，即先入为主地把壮族归为泰族。因此，长期以来，壮族研究在许多外国学者眼中，只能算是泰族研究或泰学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壮学概念的产生不可能来自外部。

壮学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也是对“泰学”的反正。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边疆的蚕食，中国政府积极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富有爱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以忧国忧民的情怀投入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同时刊载于1928年7月号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的钟敬文的《僮民考略》和石兆棠的《僮人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壮族研究的标志。随后，丁文江于1929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广西僮语研究》，魏觉钟在1931年2卷3期《新亚细亚》发表了《广西的民族——苗瑶僮狼》，石兆棠于1934年12月号《艺风》刊登了《柳州僮人的片断的纪述》，刘锡蕃于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壮族研究的最早论著《岭表纪蛮》，徐松石先后于1935年、1946年、1947年出版了《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泰族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香港东南亚研究所发行），外国人对壮族的研究从此退居次要地位。此时的壮族研究，范围上突破了前一阶段外国人的研究，涉及了壮族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婚姻家庭及壮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田野调查兴起，实地调查材料与历史文献得到了较好的结

合。以学科的投入来看，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紧密配合，共同研究，使壮族研究别有洞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成就最大的要数徐松石，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创造了“地名研究考证法”以论证壮族的历史，而且以民族的田野调查方法、语言对比法、风俗对比法对壮族的族源、历史、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潜心于壮族研究者人数较少，其贡献能与徐松石相提并论者，更是凤毛麟角，研究的深度不够。更重要的是，受中原汉文化中心史观的影响，即便是当时壮族研究最有成就的徐松石、刘锡蕃亦不能免。“僮佬也确是千真万确的汉族”、“僮族非但是远古岭南的土著，而且是今日最纯粹的汉人”等因汉文化中心主义偏见而导致的含混不清或自相矛盾的观点，大大局限了他们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成果的深化。因此，当时的壮族研究顶多只能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不可能有壮学概念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壮族被确认为统一的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享有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随着壮族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壮族研究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1951 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到壮族地区进行慰问，随团的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壮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和现状。最著名的例子是广西分团副团长费孝通教授根据调查撰写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发表在《新建设》1952 年第 1 期，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的资料对壮族的起源进行推考，认为壮族是古代东南沿海越族“余留到现在的一部分”。此后，在 1953 年开始的民族识别和 1956 年开始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过程中，政府都派出工作组或调查组对各地壮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由政府支持和组织的大规模的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取

得了大量的资料，为壮族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基础。在此基础上，一批专家学者发表了一批有关壮族起源和历史发展的文章，开始了对壮族历史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至六七十年代，尽管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党的民族政策得不到落实，壮族研究受到了限制，历经了曲折，但没有停止，关于壮族族源、壮族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仍在继续。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推动了民族研究的发展。国内研究壮族的学术机构、社团纷纷建立，从事壮族研究的人员日益增多，壮族研究走向兴旺繁荣。论文、论著成批发表、出版，不仅加深了研究的层次，新的领域也不断开拓。在壮族渊源、社会发展史、古崖壁画研究、青铜器与铜鼓研究、语言与文字的整理研究、壮语地名的整理与研究、民间文学的整理与研究、音乐舞蹈的研究、壮族与周边民族的比较研究、壮医的挖掘与研究、壮族风俗、宗教信仰、哲学观念、伦理道德的调查研究等方方面面，几乎无一没有系列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加入，使广大学者在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上，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壮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壮族自古即是一个农业民族，壮族文化作为壮族人民长期适应岭南生态环境的产物，其基本性质是稻作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迥然有别。千百年来，壮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历经重组再生，发展至今，枝繁叶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共识是人们逐步打破“汉文化中心”史观进行壮族研究的科学结晶，使壮民族由于长期受歧视、压迫而已趋于淡漠甚至于湮灭的民族意识逐渐复苏，从而为壮学的提出、壮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

二、壮学:全球化时代的召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冷战)格局瓦解后,历史的脚步跨入了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由于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世界舞台形成了政治、经济多元化的局面,许多取得了独立或复兴的民族怀抱着浓郁的民族情怀,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向西方一元霸权体系发起了全面的挑战和冲击。在文化观念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保持和弘扬本民族文化,主张多元文化,逐渐成为时代的潮流。与此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交通和信息交流的发达,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整个世界,国家、种族、民族、宗教之间的接触、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密切。人类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小小寰球"上的万事万物,人们都可在瞬息之间一览无余。任何与世隔绝的文化已不复存在。原来各自分立的人文世界正逐渐走向"世界一体"(One World)。"地球村"的形成不再是诗人心目中的乌托邦或文学家笔下的天方夜谭,而已是近在咫尺、可以亲身感受的现实。这就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说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或"全球同合"(Global Ecumene)。于是,一切边缘的、神秘的、鲜为人知的"非主流历史"被卷入了"主流",每一种文化都同时处在一种多边、多向的对话过程中,既是观察的主体,又是被观察的对象。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大门敞开,举目四顾,中华民族面对的已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国际间、地区间的多边、多向的频繁的对话和交流,促进了对中国文化内部不同文化构成的研究。如何在一个统一完整的中国文化范围内,深入研究并准确把握其内部不同的多种构成,是关系到中国文化能否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正确地认识自我,从容应对外来文化的挑战的重要课题。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中国文化研究从表面走向深入、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体现了新

一轮文化反思的平静、理性、从容和主动性。正是由于中国学术界在新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对儒家正统文化之外的各种文化现象予以积极的关注，中国文化的区域性、族别性研究，蓬勃地开展了起来。

壮族古称“西瓯”、“骆越”、“乌浒”、“俚”、“僚”、“俍”、“僮”等，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古代，一贯被视为蛮夷，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远离中原的“未开化”的群体，而且是一种不可与中原汉族同日而语的异类文化。《汉书叙传》曰：“西南外夷，别种殊域。”《汉书》卷六十四云：“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本不足郡县置也。”《桂海虞衡志》则说：“南方曰蛮，亦曰西南番。今郡县之外，羁縻州峒，故皆蛮地。”尽管这一族群很早就被网罗于中央王朝之下，由于中央王朝以中原为“天子之国”的唯我独尊的心态，对壮族先民及其他周边族群的态度都是无所用心的。作为稻作民族的壮族，安土重迁，不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周期性地侵扰中原，迫使中央王朝时常戒备，中央王朝对之更是漫不经心，漠然视之。《岭外代答》卷十云：“蛮夷人物强悍，风俗荒怪，中国姑羁縻之而已。”《桂海虞衡志·志蛮》亦云：（邕州左右江）“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

唐末五代，中原混战，岭南较为安定，壮族先民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代，侬智高统一了左右江诸峒，在屡向宋朝“求一官以统诸部”的要求遭拒绝，外受交趾侵犯的情况下，揭竿起义，反宋抗交趾。起义虽然最后归于失败，但使后来的王朝统治者对壮族先民重视起来。侬智高起义之后，宋王朝依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推雄长者为首领，给知州、知县、知峒等官，加强王朝同左右江壮族各首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明清时代的“改土归流”意味着中央王朝着手结束其对壮族人民的“以夷治夷”和“以其故俗治”的间接统治，逐步实行新的统治模式。鸦片战争后，由于战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壮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呈现前所未

有的复杂和尖锐局面。原有的农民和地主豪绅之间、人民大众和清廷之间、土著与客民之间的矛盾尚未缓解与消除，各族人民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又激化起来，法帝国主义以越南为跳板，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历史赋予了壮族人民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一场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的气壮山河的斗争，使壮族的地位和作用显露出来。而旧、新桂系的兴衰，中国共产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存在，都使传统的壮族"蛮夷"观显得陈旧、落伍、过时，甚至反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壮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政治地位的确立，如何认识壮族社会历史文化，以更好地开展土地改革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一种新型的壮族研究应运而生。但由于起步较晚，历史偏见深，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观点的生搬硬套和中原汉文化中心论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与禁锢，致使壮族的文化特色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未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而弘扬。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为壮族研究界提供了调整既有知识模式的机会，而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建设西南出海通道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践，广西"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经济区位的确立，又呼唤壮族研究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已摒去汉文化中心论的观念与方法，正逐步更新的壮族研究既面临着挑战，又孕育着新的机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壮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应运而生。

三、壮学：一个构建中的体系

壮学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以壮族为核心，扩展到国内的壮侗语民族、东南亚的侗台语民族等亲缘民族及其他一切相关民族的研究，具有发散性、开放性。壮学同时又是一种视角。这种视角既有别于从中原汉文化的传统空间观念出发的传统的民族研究，也有别于西方或东南亚学者的先入为主的"泛泰"视角，采取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是整体观、比较观和相对观。因而，壮学不是一个封闭的学科，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构建这个体系的目的，不是要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而是要开展和深化交流与对话，促成文化自觉，创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文美境。壮学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利于增进壮族人民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引导他们更加自觉地为包括壮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奋斗，而且可促进壮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尤其对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因而，构建壮学体系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壮族研究是广西民族学院科学研究的特色和优势。为了抓住机遇，发展和强化办学特色，以特色优势学科辐射、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扩大和形成新的优势学科，将广西民族学院办成在区内外和东南亚地区有一定影响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高水平的综合性民族大学，2003 年 9 月，广西民族学院整合校内外壮学研究力量，组建了跨院系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壮学研究中心。同年 11 月，该中心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批准为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扎扎实实搞好基地建设，为把壮学研究中心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咨询服务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实现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落户广西的零的突破而努力。《中国壮学文库》的创建正是此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期望它能得到各界的精心呵护，期望它能为进一步推动壮学研究的发展，构建壮学体系发挥重大作用。

何龙群　李富强

2005 年 8 月 1 日

前 言

壮族是中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是壮族人民生活聚集的主要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生活在广西壮族地区的广大壮族人民，不仅根据自己所处地域的自然条件，开创出了极具地方色彩的医疗实践；而且也开展了与这种医疗实践以及与广西壮族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相适应的药材贸易活动。我们知道，在特定地域内产生的医药及贸易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该地区自然因素所赋予的特征。正如我们常说，黄河孕育了中原文化，孕育了中原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广西壮族地区独具风格的山水，无疑也为该地区的壮族医药文化以及药材贸易模式，注入了别具风采的内涵。

壮医药作为壮民族古老、多姿文化的组成部分，已经引起了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壮医药的学术成果不仅见于学术期刊、通史著作，近年更有研究壮医药发展历程的专著问世（如，黄汉儒等，《壮族医学史》，1998 年）。但迄今为止，学界同仁似乎还没有对近代广西壮族地区多样性医疗实践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这些医疗实践中的文化内涵，进行较系统地解析。笔者认为，广西壮族地区具有不同地域特点的医疗实践，不仅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科学成果，同时也是壮区社会、文化土壤培育出的、凝聚着壮区人民传统精神的文化成果。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医学层面上对这些医疗实践进行研究，而且也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笔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即对壮区多样

性医疗实践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这些医疗实践中的文化内涵，进行一些分析、探讨，并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多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集市/圩市贸易，不仅是中国国内学者研究的课题，也吸引了不少海外学者的关注。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更有诸如施坚雅(G. W. Skinner)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问世。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在其研究中国农村贸易市场的过程中，大都将重点放在了农产品及生活日用品的贸易活动上，而没有对传统药材的市场运作模式进行系统的探讨。

我们知道，药材对于消费者(患者)来说，比那些非生存所需的农产品及生活日用品更具生存必需品的性质。我们还知道，与农产品和生活日用品相比，药材生产对自然环境有着更高的依赖性；换言之，自然环境对药材生产有着更强的制约性。药材的这些特性，无疑会导致消费市场对药材产品的刚性需求，以及自然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药材市场线路的制约。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广西壮区内外多样性的医疗实践对区内地产药材的需求，壮区特有的自然环境对药材生产以及药材产地与市场间运输线路的影响，不仅为广西壮族地区的药材市场模式注入了异于该区其他商品市场系统的特质，同时也为这一市场模式增添了鲜明的环境特征。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笔者将分别对清末、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 30 年等不同时期内，广西壮族地区药材市场系统的这些特质、特征进行分析、探讨；并希望，这一抛砖性的探讨，能够引来学界同仁研究相关问题的如玉之作。

广西壮族学者凌树东、蒙元耀为笔者的此项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对本书的写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与资助，笔者愿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第二部分“广西壮族地区的药材贸易”，是以笔者英文

专著 *The Marketing of Traditional Medicines in China, the case of Guangxi* 中的部分内容(第一章第 26 页至第 30 页、第二章、第四章以及结论)为基础撰写的。此英文专著由 The Edwin Mellen 出版社于 2005 年在纽约 Lewiston 出版。经申请,The Edwin Mellen 出版社已经允许笔者在本书中使用上述章节的内容。在此,笔者谨对 The Edwin Mellen 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杜立平

2006 年 12 月

Foreword

The people now officially classified as Zhuang (壮) is the most populous of all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hina, and indeed, constitute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Guangxi.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the Zhuang people not only have developed indigenous medical practices in various forms, but also have undertaken, following different marketing models, medicine trade within the region and across the country. We understand that indigenous medical culture and trade in traditional medicines in a region are in varying degrees shaped by the region'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the Guangxi Zhuang region is no exception. As we often say, the Yellow River gave birth to the culture of central China,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in the Guangxi Zhuang region undoubtedl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Zhuang medical and trading cultures.

Zhuang medical practices have drawn attention from a number of scholars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research undertaken by these scholars has l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 articles, chapters and sections in monographs of general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moreover completed a monograph focusing on Zhuang medical history and practices (Huang Hanru et al., *Zhuang Medical History*, 1998). It must be noted, however,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Zhuang medicine has not yet investigated in detail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on the

cre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medical practices in the Guangxi Zhuang region. It is understood that various Zhuang medical practices are a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Zhuang people not only in scientific terms, but also in their rich soci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 In the part that follow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ramework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practices will be particularly investigated, as well as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Zhuang medical culture.

Periodic rural marketing as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he traditional agrarian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spatial organis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began to attract scholarly attention in the 1930s. G. William Skinner and other scholars, including the Chinese scholar Zhong Wendian,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60s (for example, Skinner, G. W.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Part II and Part III", 1964, 1965). While providing an important benchmark reference for this study, works written by Skinner and other scholars have in large part focused on 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veryday household items, 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of specialised products such as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s.

We understand that the market demand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s as commodities is much more inelastic than tha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veryday household items, and the production and hence the marketing of traditional medicines are also constrained more by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n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the latter. All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as t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